



中央民族大学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中央民族大学建校 50 周年丛书



# 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

荣仕星/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编委会

主 任 王 彦 荣仕星

副主任 张 儒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彦 任中夏 严玉明

陈 理 张 儒 郑玉顺

荣仕星 梁庭望

主 编 荣仕星

副主编 张 儒 邱久荣

# 目 录

|                           |       |
|---------------------------|-------|
| 发展中的中央民族大学·····           | (1)   |
| 教学工作五十年·····              | (17)  |
| 科研工作五十年·····              | (64)  |
| 特色鲜明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 (96)  |
|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     | (128) |
| 加快改革步伐，跨入新的世纪·····        | (149) |
| 附录：                       |       |
| 中央民族大学大事记（1950—2000）····· | (170) |
| 后记·····                   | (247) |

## 发展中的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创建于1951年6月11日，原名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

经过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中央民族大学不仅是我国56个民族团结友爱的象征、我国民族工作的窗口，而且发展成为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干，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民族问题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centers，在国家高等教育事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已被列入国家21世纪的“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

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占地面积3357098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278098平方米。校本部在编教职工1462人（教师712人），其中正高级职称99人、副高级职称302人；有博士后7人、博士学位55人、硕士学位234人，少数民族占40%。在校学生7349人，其中博士生110人，硕士生339人，本科生3549人，专科生77人，预科生266人，中专生374人，函授生1665人，夜大生321人，成人脱产教育班435人，留学生213人。

全校设有经济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艺术学院、理工学院、藏学研究院、成人教育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和研究生院；哲学与宗教学系、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维哈柯语言文学

系、朝鲜语言文学系、历史系、外国语系、经济与管理系、教育系、美术系、音乐系、舞蹈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物理与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生物化学系、体育系 18 个系；预科部、马列教科部、社会科学教研部、现代教育技术部 4 个教学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藏学研究所等 52 个研究所和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图书馆、民族博物馆、出版社、期刊社等教辅单位。图书馆藏书 110 万册，其中民族类与边疆史地古文献尤为丰富，为国家有影响的图书馆之一。民族博物馆收藏 2 万多件文物。办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民族教育研究》和《中央民族大学周报》等报刊，均为国内外公开发行。

学校拥有 2 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 个全国普通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4 个部委级重点学科；41 种本科专业，有 2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9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一级学科 1 个）、2 个博士后流动站。

学校在重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共编写教材 1300 多种。在科研方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强调民族特色及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资料，共承担国家和部委重大科研项目 225 项（1981 年以前，没有资料），发表论文 6727 篇，出版著作 2308 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宗教观教育是学校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各民族师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校风，也被人们公认为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缩影和窗口。学校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与 9 个国家的 42 所大学建立校级友好关系或签订交流协议，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文化学术交流和接收留学生。50年来，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人才6万多人。他们在国家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任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干部70多人，以及一大批民族学科学术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因此，5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一直为全国和世界各地人士所瞩目。

学校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不懈地对各族师生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始终高举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大旗，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有特色的工作体系，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一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努力做到专门工作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相结合，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与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学校的党校，已举办各种培训班20期，培训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各类人员4500人次。1990年以来发展新党员近千人。学校多次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等多种荣誉和奖项。

中央民族大学的50年，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的，其成长壮大和所经历的曲折，基本上都与全国总形势一致，但又有自身发展的特点。下面按五个发展阶段进行概述。

###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1950年6月—1951年底）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青年，1941年在延安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这是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解决民族问题的体现和经验。

1949年12月14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应办少数民族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人才的任务就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大议事日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0年1月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座谈会。会后，根据延安民族学院办学经验，在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主持下，由民族问题理论家、原延安民族学院领导人刘春执笔向中央呈报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这两个方案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阅后，政务院决定立即筹建中央民族学院。同年6月10日任命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刘格平兼任正副院长。8月调内蒙古东蒙区党委书记刘春来京，负责筹办工作，9月任命刘春为副院长，主持工作。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会议正式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于12月28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公布。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必要时还可增设。”在实际实施中，各地区相继建立的民族学院均独立办校，惟有中南民族学院曾称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

《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对中央民族学院办学任务、教学方法、管理体制以及各相关事宜都做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了三项办学任务：“一、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宣传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三、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还明确规

定中央民族学院建立研究部。“研究部按民族或按几个较为接近的民族分为若干研究室。尽可能将目前各大学和国内各地研究上述问题的适当人才集中到民族学院。”

根据上述两个《试行方案》，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自1950年下半年开始了。首先，选定国子监为临时校部，并在其邻近的分司厅、柴棒胡同、东四七条等处选择了教职工临时宿舍。一切都因陋就简，真正是艰苦创业。其次，有了立足之地后，一方面调集师资和工作人员，并决定招收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藏语班，组织生源，准备开学；一方面选定了西郊新校址，精心设计，破土施工。

经过一年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至1951年5月底，有教职工283人（不包括附中，1950年决定把北京蒙藏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其中教师14人；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藏语班学员共262名学生。5月28日正式开课。

1951年6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出席典礼。朱德、董必武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各少数民族的花朵在毛主席民族政策春风的披拂下，将日胜一日地开放起来”。从此，6月1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的日子。

### 第二阶段，规范建设（1952年—1966年5月）

1952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首先，这一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和学校的请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民族语文专业师生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40余名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也并入中央



民族学院。其中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家潘光旦、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著名的历史学家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等，著名的语言学家于道泉、王静如、马学良等，使中央民族学院人才济济，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声名大震。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研究部和少数民族语文系。同年还成立了政治系。两个系皆以本科教育为主、专科教育为辅。另外，这一年夏季，北京西郊的新校舍主体工程完工，学校由国子监临时校舍迁入新校舍。新校舍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设计与施工，整个校园布局合理，典雅隽秀，错落有致，美丽如画。在国家百业待举、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群。可以说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渗透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中央民族学院的高度重视。这两件事为中央民族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影响到今天。

中央民族学院建立后，一直受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特殊关怀。至1966年5月，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14次接见学校师生代表。其中，1957年6月，毛主席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全校数千名师生员工，并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先后来院视察工作。这些是在京任何高等学校也没有享受过的殊荣。

在党中央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得到稳步发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已设有政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历史、汉语、艺术5个系44个专业，另设预科一部、二部，在校生2647人，有教职工近900人，形成了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初具规模的文科高等学校，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十五六年中，中央民族学院为国家培养了近万名各类专业人才。他们在国家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对各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一时期里，学校广大师生参加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后改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和领导的全国性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族识别、为一些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编写民族问题《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工作，并起了主导性作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不仅是国家一项重大政治工作，也是民族学科的一项重大学术活动。它不仅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确定一些民族成分，为一些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提供了依据；而且调查资料具有抢救性质，为后来编撰民族问题《五套丛书》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学校广大师生参加了这项重大活动，为国家民族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培养了人才，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民族史三大学科得到充分发展，令世人瞩目，确立了学校在全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不可取代的地位。

当然，这一时期的后半期也出现了“左”的干扰。1957年“反右派斗争”造成一批冤假错案，著名学者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副院长）、闻宥等都蒙受了不白之冤。与此同时，民族学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科。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批白专”，1964年后的大批师生放弃学业参加“四清”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对广大师生造成了伤害，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学校的健康发展。

第三阶段，“文革”岁月（1966年6月—1976年底）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一切教学、科研活

动被迫停止。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8月初，工作组因执行了“刘少奇反动路线”而撤出。学校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1967年1月，师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各以“造反派”自居，长期打派仗。1968年7月，工、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不久成立了革委会，并开始分配66、67、68级毕业生。然后进行“整党”、“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11月，大批教职工及其家属赴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1970年初，开展大规模的“反516斗争”。同年分配69级毕业生，至此学校完全没有了学生。1973年5月，沙洋“五七干校”撤销，大批教职工返校，少部分转入河北省固城农场，继续种地。

在这期间，在名目繁多的政治斗争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特务”、“现行反革命”、“516分子”、“黑五类”、“臭老九”的帽子满天飞，大批教职工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副教授、教授和处长以上干部几乎无人幸免。有一部分教职工和个别学生遭到批判斗争、游斗、隔离审查、抄家以及其他损害身心、侮辱人格的残酷迫害，其中潘光旦、傅乐焕教授等被迫害致死。这是一场噩梦，是浩劫，是灾难，后人当永为鉴戒。

中央民族大学是在“文革”中最先恢复招生的高等学校之一。1972年招生开学，学制二年，生源为地方政府推荐。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教学秩序很不规范，从办学思想到教学方法，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都受到很大限制。政治运动不断，又搞“开门办学”，学生学习时间受到限制。不少教师因政治问题不能上课，能上课的教师也顾虑重重，有的没上几天课就遭到批判。凡此种种，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前建设成的忠于民族教育事业、学有专长的师资队伍和热心于民族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干部队伍，虽受“文革”种种磨难，但他们痴心不改，意志弥

坚。由于“文革”中的招生，这两支队伍被保留下来，为以后学校秩序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部在“文革”期间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邝平章、张锡彤教授等共同翻译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册（北京大学负责上册翻译）、美国海斯·穆恩和韦兰合著的《世界史》、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王钟翰教授参与点校并负责全书通稿的《清史稿》点校工作也已完成。上述工作当时都属于国家政治任务。另外，研究部还为外交部提供了中苏边界的有关资料。

#### 第四阶段，综合发展（1977年—1993年10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对“文革”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甄别，予以纠正、平反、昭雪。同时，学校完全恢复了教学与科研的正常秩序，并把学校的一切工作纳入国家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轨道。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不仅“文革”前各系全部招生，而且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1978年建立了数学物理系，设有数学、基础物理两个专业，使学校向多学科的综合性和大学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阶段是中央民族学院发展时期。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水平、教学设备及校舍建设等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和大学。

在办学规模上，1980年在校生达到2200人，至1981年秋季，则发展到3000余人，已超出“文革”前的最高数字1963年的近2800人。然后逐年递增，至80年代末期达到6000余人。

在办学层次方面。“文革”前有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中专生和预科、干部训练班7个层次。少数民族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都曾招收研究班，历史系还招收过民族学副博士研究

班，但并不正规，也不经常；本科生是主要的办学层次。少数民族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汉语系及文艺系的美术、作曲、声乐、器乐专业主要招收本科生；少数民族语文系和政治系曾招收少量的大专班；中专生主要是文艺系舞蹈专业；预科分两种类别，预科一部相当中学教育，是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子女能顺利地上大学而创办的，预科二部则是专门为西藏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相当中专；干部训练班设在政治系，以新疆班为主，学制一年，培训县地级在职干部。

“文革”后的主要变化是：预科性质发生变化，主要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招收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补习，学制一年。最大的变化是研究生教育不仅正规，而且发展较快。1978年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教育时，即获准招收民族学、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批准的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4年又获得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另外，1984年开办夜大学教育，次年又开办函授教育。这样，学校的办学层次是：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专、预科、干部训练班、夜大、函授9个层次。这是任何其他大学所没有的，它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需要以及学校的实力而形成的特色。

在学科建设方面，表现的也十分突出。1983年建置民族学系。1986年分数学物理系为数学系、物理系；同时建置生物化学系；在政治系基础上建置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系（蒙古、藏、朝鲜语言文学3个专业）、二系（维吾尔、哈萨克语言文学2个专业）、三系（壮、彝语言文学和语言学3个专业）；在公共外语教研室基础上建置外国语系。1988年建立计算机系。“文革”前的文艺系，于1983年分为音乐舞蹈系、美术系，1992年底分音乐舞蹈系为音乐系、舞蹈系。大致说来，至1986年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基

基础框架已经确立起来。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文革”前毕业的中青年教师起了骨干作用。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学术带头人；同时不断从本校和外校选留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少量的本科生扩充师资队伍。师资队伍不仅形成了规模，梯队也趋于合理，基本解决了“文革”所带来的断层现象。80年代后期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引进数十名教师，他们为学校理科各专业的发展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科研方面。“文革”前，1956年分出研究部一部分人员成立历史系，不久剩余人员全部调出学校，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校也就没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1972年，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重大科研任务，以“文革”前历史系教师为主恢复了研究部（初称研究室）。1980年底改名民族研究所。同年又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81年又成立了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藏学研究所。这五个研究所的相继建置，反映了学校科研活动登上一个新台阶，也反映了学校不仅要把学校建成少数民族问题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基地，也要把学校建成少数民族问题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一直到今天，这五个研究所仍然是学校研究机构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科研成果累累，“七五”、“八五”、“九五”期间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一直处于前四名，其中林耀华教授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民族学通论》，费孝通教授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马学良教授主编的《语言学概论》，陈永龄教授主编的《民族词典》，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陈兆复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前岩画》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五阶段，争创一流（1993年11月—2000年）

在这期间，学校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根据学校的教学与科

研的实力，1993年11月3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中央民族学院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非常关心，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了校名，李鹏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等题词祝贺。在学校隆重集会庆祝时，李岚清莅临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二是1997年10月，学校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9年1月，又通过了“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立项审核。我校进入了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的行列。这两件事对学校教学与科研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1995年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办学层次上又上一个台阶。

在这期间前期，因各种原因，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处于滞后状态，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000年是学校的改革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开辟了学校新的历史。

2000年3月，根据学校工作发展的需要和大多数教职工的强烈要求，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序幕。首先，根据教育部的指示精神，精简学校的党政管理机构。采取合并、撤销等措施，将全校党政管理部门的处级单位由原来38个缩减为22个，科级单位由原来的74个缩减为52个。处级干部由原来60人减为42人。同时，各部、处的处级、科级和科员一律采取聘任制，公开竞争上岗，聘期为四年。这两项工作仅用三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与此同时，还进行后勤改革，成立了后勤服务中心，走出了后勤社会化的第一步。其次，调整教学与科研单位。1994年，学校建置了民族学研究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和干部管理学院，但长期以来校、院、系三级管理任务不明确，影响了教学工作；同时大量教学单位还没有建立二级学院，没有形成相关学科的教学群体，难于做到规模效益和优势互补。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研究，6月形成调整方案，7月初开始聘任院、系两级领导班子，8月下旬顺利完成工作。8月底，即按新的院、系建制和新的领导

班子进行迎接新学期的工作。经过这次调整 and 改革，即形成了现今的 8 个学院和 1 个研究生院、18 个系、4 个教学部、52 个研究所和一个研究中心的教学与科研体系。

经过上述改革，理顺了学校党政部门的工作关系，各部、处职能明确，效率提高；减少了处级干部职数，精干了队伍，克服了人浮于事的局面；建立了相近学科群体协调发展的机制；理顺了校、院、系的工作关系。上述改革得到了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工的支持和欢迎。目前，学校正积极着手后勤管理社会化和附属单位社会化的改革，以及教师职务的评聘分离、实行教师聘任制等工作。

在这一年里，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有了新的突破，获得了宗教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史 4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首次突破了我校没有理工科硕士点的状况）。它不仅反映了学校学术地位，也为学校迈入 21 世纪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了适应 21 世纪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根据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需求的预测和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央民族大学教育事业“十五”计划纲要和 2015 年发展目标》。

确立了学校“十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面向”，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西部开发、“兴边富民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创新意识的培养。深化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教学基本建设，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争取在产、学、研相结合上有所突破。密切联系社会，



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办出水平，突出特色，提高效益。

确立了学校“十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即：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分步骤、有重点、高质量地进行学校各项建设。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以外争拓展力、内争凝聚力为基础，发挥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综合水平。并在几个方面实施工作：1. 深化改革，强化管理；2. 加大投入，改善条件；3. 突出特点，创新培养模式；4.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5. 加强科学研究；6.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7. 加强民主建设，依法办学。

确立了学校“十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

1. 办学规模。2005年在校学生达到17300人。其中本科生9000人，成人教育6000人，研究生1300人，留学生500人，预科生500人。

2. 办学条件。到2005年新增建筑面积102600平方米，总投资29300万元，达到30m<sup>2</sup>/生；新建图书馆15000平方米，实现馆藏图书160册/生，并加大电子光盘版网络图书资料和镜像资料的收藏与利用；投资1000万元用于实验室建设，2005年达到教学仪器设备费6000元/生；专任教师达到800人，其中高级职称占6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达到80%；学科与专业建设方面，到2005年发展到10个国家级和部委级重点学科，拥有3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2个博士后流动站。

3. 教育结构。加快发展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成人教育，稳定并适度扩大预科生招生规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4. 办学模式。积极探索联合办学、合作办学、与异地合作办学、与境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实施远程教育等多种办学模